

教 育 篇

许慎、应奉与尹珍

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是尹珍。珍字道真，东汉牂柯郡毋敛县（大约在今独山、荔波一带）人，生活在汉章帝至桓帝（约公元 79~153 年）之际。青年时代，苦于家乡一带文化落后，没有学校，便毅然跋涉千里，奔赴京都洛阳，拜许慎为师。许慎是名重古今的经学大师和文字学大师。

尹道真跟随许慎学业完成后，返回牂柯，在潞县（今遵义一带）境内教授生徒。从此，蛮荒的南中地域开始有了传播中原文化的学舍。

后来，另一位学者应奉（字世叔）来武陵郡任太守，尹珍又前去拜他为师，学习图纬之学，精通“天地人”三才之道。尹珍成了饱学之士，名声渐大，被朝廷选去作官，历任尚书丞郎，官至荆州刺史。此时他的老师应奉在朝廷当了司隶校尉的大官，师生二人同时显闻，被传为佳话。

关于尹珍在牂柯从事教育的具体情况，由于史书（《华阳国志》与《后汉书》）记载简略，已无法考知。仅从古代一些碑刻、祠、墓的遗迹中，约略推知一些情况。

唐僖宗广明元年（公元 880 年），播州司户崔昶在当时遵义县东北百里处（今绥阳县旺草场）修建尹珍讲堂。后毁圮。直到明万历三十二年（公元 1604 年），绥阳知县詹淑在望草

(即旺草)修建公署时,从地下挖出一方石碑,碑上题字云:“汉尹珍讲堂,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昶立。”于是詹淑就将公署改为尹珍讲堂,还写了《铭》,刻石立于堂中。后来,此堂与碑刻均毁坏,地址也有变迁,最后移到旺草场附近。清代晚期,旺草有两位士绅在废址上建怀古楼,用以纪念先贤尹珍。

据传说,在正安境内有尹珍住宅和坟墓。明万历四十年(公元1612年),遵义知府孙敏政得知正安城东一百二十里的三江里七甲某处,据传为尹珍住宅遗址,便在此修筑务本堂。清康熙年间遵义知府陈师沅缮修,嘉庆年间正安知州赵宜霖又加修葺。此草堂有三楹,别名乐道书院。咸丰年间,正安知州朱白谷、于钟岳相继重建。于氏写有《尹道真先生务本堂碑记》,记述此堂修建及兴衰始末。同治年间,此堂被焚毁,光绪四年(公元1878年),正安知州尹树堂重修。据嘉庆《正安州志·坟墓》载:“在正安州治江三甲务本堂后,有尹珍之墓。”为纪念古代教育家、文学家尹道真,民国三十年(1941)特将正安县东北地域分割出来,设立道真县;今天为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。

明、清以来,黔中各地纷纷建祠奉祀教育史上的先行者尹珍先生。据道光《贵阳府志》载,明隆庆五年(公元1571年)在贵阳城东建阳明书院,奉祀王守仁,院内兼设尹公祠,奉祀尹珍。清雍正年间,该书院改名贵山书院,清末圯废。嘉庆年间,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间另建阳明书院,仍在院内建尹公祠配祀。光绪年间,移尹公祠于惜字所,取名“敬业楼”。民国初年拆毁后,贵阳人士又在扶风山间另建尹公祠,保存到解放以后。

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于府学宫左阁上，创建《汉三贤祠》，奉祀舍人、盛览、尹珍。郑珍写有《汉三贤祠记》，考证三贤行迹，阐发奉祀三贤的因由。

光绪十年（公元 1884 年），独山州建尹公祠。独山为汉代毋敛县疆域，算是尹珍的故乡。惜该祠已于民国初年毁圮。

又据光绪《铜仁府志 坛庙》载：尹公祠，在铜仁书院内，奉祀汉儒尹珍。另据道光《印江县志 祠祀志》载：尹公祠，在印江书院内，奉祀东汉尹珍，以明代李渭（思南人）附祀。

在贵州教育史上，像尹珍这样受后人景仰、千余年不衰的人物是绝无仅有的。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。

尹珍的行迹中体现着一些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，重要的有两点：一是不甘落后，千里远学的精神；一是热爱乡土、献身教育的精神。

在洛阳向许慎学习经学与小学（文字学），返回南域以此教授生徒。由于时代久远，承传其学的生徒已无法查考，但他所传的许氏之学却永传不息，到清代形成空前鼎盛的局面，成果辉煌。莫与俦把汉学引进贵州，使 1700 年前尹珍所传的许学在毋敛故土上再度萌生。与俦之子莫友芝把尹珍之学称之为“毋敛学”，把自己视作“毋敛学”的传薪人，力求世代传续下去。他在《用甯韵送子厚归都匀应童子试兼示大猷、远猷两犹子》中写道：

矧此平生毋敛学，一线将湮尤可恼。

幸我犹能道麤粗，尔曹正应恭持保。

... ..

道真茂理要传薪，祖训书绅莫轻掉。

他为‘母斂学’的形将湮没而忧心,要兄弟和侄辈保存此学的一线生机,传薪有人,并把此作为祖先遗训书之绅带,永志不忘。莫庭芝也研究《说文解字》,为‘母斂学’的复兴作过努力。后来,莫友芝写了《唐本〈说文〉木部笺异》、《韵学源流》等专著,流播中外,使“母斂学”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。

莫与俦的门人郑珍,一度去长沙拜程恩泽为师,借游幕以游学,为时近两年。程恩泽指导他研读《说文解字》等专著。后来又亲自审定郑珍所写《说文新附考》书稿,充分肯定其成就,并指出修订的意见和研治方向。郑珍‘东学长沙’,与尹珍‘北学中原’后先辉映,成了黔中文化史上的两则佳话。

郑珍著有《说文逸字》、《汗简笺正》等十多种文字学专著。其子郑知同著有《说文本经问答》、《六书浅说》等几种专著。父子二人的成就足以与中原学者相媲美,郑珍被学界公认为汉学大师。通过郑、莫诸人的努力,承续了尹珍的‘母斂学’,并把它推向空前的高度,结出累累硕果。

尹珍献身教育的精神,其影响尤为深远。从唐代崔祐所建的尹珍讲堂,明代詹淑重建的讲堂,直到晚明孙敏政所建的务本草堂,都是这种精神永昭日月的标志。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在龙场驿建龙冈书院,教授生徒,正是步武尹珍‘教化南域’的伟业。一些从事教育的黔中文士,把尹珍作为自己的楷模,其中郑珍、莫友芝就是杰出的代表。

郑珍在长沙程恩泽幕中游学时,程先生为激励郑珍学习尹道真先生的精神,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乡邦的教育事业,特地给他赐字为‘子尹’,以尹珍之姓为字。郑珍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道:

汉朝道真公,贻今贵州书。

盍即字其姓，子岂西家夫！

（《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邵亭二首》）

郑珍辞师回黔时，程先生见他学业有成，欣然地说道：“吾道南矣！”正与当年许叔重送别尹道真时的情景相似。

从此，郑珍谨守师训，主讲本府的书院，三度出任儒学训导。其中一次在古州（今榕江），一次在荔波。两地都属汉代毋敛县疆域是尹道真的故乡。郑珍初任教职在古州，感到几分快慰，诗中有“诂知试手处，即是毋敛区”之句。十年之后来荔波任训导，自然又想起尹先生来。《初到荔波二首》之一写道：

叔重弟子起遐荒，毋敛封疆入渺茫。

始笑平生称小尹，坐疑今日到家乡。

欣慰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所教生徒“夷汉参半”，郑珍一视同仁，谆谆训诲，使这一带向学之风蔚然兴起，流惠至今。

莫与俦也很景慕尹珍教化南域的风范，常以此勉励儿子莫友芝。友芝谨遵父训，终身以教育为职志。他在《湘川讲席四十生日二首》中写道：“成童记侍先君子，受学曾居旧讲堂。雨化至今思有敛（王莽时，改毋敛为有敛），奉持遗训益徬徨。”可见尹珍献身教育、传播文化的精神，已成为激励后人的巨大力量。黔中文士大都以献身教育为荣，乐于培育人才，追根溯源，不能不归功于尹珍先生所树立的光辉榜样，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。

尹珍不仅是教育家，也是位书法家。其书法的有关情况附录于下。

尹珍研习书法，也受其老师许叔重的启导。叔重撰写《说文解字》，搜集了古今各种书籍、简牍、碑刻和钟鼎款识。其中不少出自书法名家之手，书艺精妙绝伦，引起尹珍极大兴趣，有意摩习。

中国的书法体势，殷、周时期有甲骨文、铜器铭文，后衍生为大篆（籀文），秦代出现小篆，汉代有隶书，随之而出现章草、楷书、行书、今草。东汉晚期，书体发展已初具规模，书法已被明确地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，涌现了一批著名书法家，也产生了论书法艺术的理论专著。早于尹珍的有杜度、崔瑗（著《草书势》一书），晚于他的有蔡邕、张芝（时称“草圣”）。许慎也是位书法名家，他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论及书法的审美意识问题。如他所倡导的“六书”原则（即“指事”、“象形”、“形声”、“会意”、“转注”、“假借”），阐发了“象”与“意”的关系，提出“立象以尽意”的准则。依照“六书”创造出来的文字，既是一种指意的符号，又是以一种抽象概括的方法表现不同自然物的形式结构，从而使自然的感性形式的美，渗透于文字形象之中。这样的文字，正是一种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创造。这种“形”与“意”的高度统一的原则，正是中国书法和绘画的审美意识的起点。

尹珍对其恩师的理论精微自然体会深切，书艺的提高很大，终于跻身于中原书法名家的行列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尹珍的书法墨迹或碑刻，而今已无法找到，只能从某些古籍中察知一点端倪。南北朝刘宋时期，书法家王愔写有《文字志》一书，该志评述秦、汉、魏、晋间 120 位书法家。其中有李斯、杜度、许慎、崔瑗、蔡邕、张芝、曹喜、刘德升、钟繇、曹操、卫觊、卫瓘、索靖、卫恒、卫夫人，以及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。

尹珍也单列一目，与这些书法家平列，足见其书法造诣颇高。

王愔比尹珍晚300年，他一定亲自鉴赏过尹珍的书法作品，经过一番比较和选择，终于把尹珍收入《文字志》中。可见南北朝时，尹珍的书法仍享有盛名。可惜《文字志》一书后来失传，无法了解对尹氏书艺的具体评价。唐代张彦远的《法书要录》一书，录引了《文字志》的篇目，才使尹珍作为书法家留名后世。

巴蜀文士与播州文化

东汉晚期的教育家尹珍，把中原文化引进南中地域。可惜传薪乏人，千多年间没有出现文化方面的显闻人物。如究其原因，还得从南中各民族与历代中央王朝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方面来考察。各代王朝虽在南中地域设立郡（州）县，但直接行使政权的时期维持不久，大都以土著豪酋为郡（州）县长官，朝廷不过以“羁縻”的形式遥领而已。而各豪族之间，各民族与中央王期之间，又不时发生战争；豪族大姓与被剥削的部曲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时缓时紧。这必然影响南中各地经济的繁荣，也影响了中原文化与南中文化的交流。

与巴蜀接壤的播州（今遵义地区），唐代晚叶一度被南诏攻占。杨端领部曲（杨保族）入据播州，归附中央王朝。其子孙世代相袭，历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各朝，为时720余年。到南宋初年，杨端的第十代孙杨选执掌播州政柄。从他开始，杨氏领主注重文教事业。

杨选字简夫，在“务农练兵”之暇，很喜欢读书，聘选名师来教授经史百家之书。又喜欢与文人交游，只要听到有贤能的

人才，不惜用重金招聘。每年出入播州的文士不下数十百人。有一位叫房禹卿的益州文士，到罗闽地区（今大方、黔西一带）贩马，被当地人抢去作奴隶贩卖，辗转被卖了几回。杨选打听到他的下落，用钱赎买出来，安置在客馆中以宾客相待。房禹卿在播州住好几年，尽心教授杨氏子弟。有一年正当全国的科举大考，房禹卿很想去应试，却不便启齿。杨选察知了禹卿的心思，激励他去投考，还派人护送禹卿回益州（今成都）应解试。禹卿考中解士，杨选又馈赠一份厚礼，作他赴京城临安（今杭州）的盘缠。后来房高登皇榜，成了进士。杨选资助蜀中文士，成了播州历史上的一则佳话，流传至今。

杨选之后，他的两个儿子杨軫、杨轼相继执掌播州。杨軫把播州治所由白锦堡迁到穆家川（今遵义市老城）。这里地势开阔，山水秀丽，给经济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。他把政务交给弟弟杨轼。轼很留意艺文，尊重文人学者，蜀中文士纷纷投奔播州。杨轼为他们修建房屋，分割田产，让他们安居乐业。又安排他们的工作，或团馆授徒，或从事文笔，或掌管钱粮，充分发挥其专长。通过蜀中文士的一番教化之功，“由是蛮荒子弟，多读书攻文，土俗为之大变”（郑珍《遵义府志·土官》）。

杨轼之子杨粲执掌播州之后，对文教事业更加重视。杨粲自幼承蜀中文士的教授，对儒家的经典读得很熟，深受儒家思想的陶染。掌政后极力提倡儒家学说，首次在播州建修学宫，聘请学问渊博的蜀中文士任教，命族中聪颖子弟入学攻读。杨粲治家治播都很有办法。政治措施以“宽简”为准则，很得民心，经济与军事实力都大为增强，多次捐银输马去抗金前线，抵御金兵的入侵。他立下《家训》十条，即“尽臣节，隆孝道，

守箕裘，保疆土，从俭约，辨贤佞，务平恕，公好恶，去奢华，谨刑罚”。对其子孙有较深远的影响。

杨粲所建学宫，是属官办的儒学。学宫的主讲由官府委派，有一定的官阶；入学生徒也非一般学童，必须取得生员（秀才）资格。它是该地的最高学府，与私人开办的私塾、学馆有本质的区别。开设学宫，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：教育的普及程度，学童的学识水平，师资的选择，缺一不可。后来，杨粲之孙杨文执播，修建孔子庙，使学宫的设施更加完备。

在贵州教育史上，杨粲所建学宫是第一所官办学校，意义重大。郑珍对此作了高度评价，如云：“南渡后，选始择师礼贤，轼益留意变俗，蛮荒子弟乃多读书。至粲，乃始建学。再传至文，乃始建孔子庙。则遵义学校之设，盖与杨简之拓临安，与权之建钱塘，同时并著矣。天荒文化，不以此欤？”（《遵义府志·学校一》）

杨粲的儿子杨价（音介）、孙子杨文执播期间，也很重视文化教育。杨价好读书，又善于写文章。由于杨氏祖孙几代人的倡导，播州人读书问学的越来越多，其中学养深厚的也不少。但当时国家设科取士却没有播州的名额。为了给播州读书人寻求一条进身之路，杨价便向宋王朝上奏章，说明播州文教渐开、文士向学的盛况，请求朝廷准予贡士，得到“岁贡士三人”的名额。宋代科举考试分为州府试、礼部试、殿试三级。州府试称“解试”，礼部试称“省试”。地方偏远者可不参加省试，由地方长官或朝廷差官考试，称为“类试”，合格者直接参加殿试。

播州所贡的解士，有一位名冉从周的，中了嘉熙戊戌（公元1238年）科的进士，当时人们称之为“破荒冉家”。他确是贵

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，后来出任过珍州守，有政绩。自此以后，播州人接连有高中进士者。单是南宋时期，就有杨震、李敏子、犹道明、杨邦彦等 8 人。

杨文执掌播州时，创建孔子庙，使儒家经典与礼教在播州地域传播更加深入。这时正值元兵多次进攻四川，战火延烧全蜀，为时四五十年。蜀中人士往往举家迁来播州避乱，把这里视作“世外桃源”。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，也带来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，进一步推动了播州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其中一些文士长期定居，子孙便落籍于播州。他们多属汉族，与播州土著杨保族、苗族、葛獠（今仡佬族）等族杂居，在改变土俗、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方面，无疑是很有作用的。

由于史料在历次兵燹中毁散，除房禹卿一人外，其他来播州的蜀中文士已无法考知其姓名行迹。播州的人才，主要是由蜀中文士培育出来的。他们既然能培育出冉从舟、犹道明、杨震等荣登进士榜的文士，而他们自身的道德文章必然是斐然可观的。

总而言之，客籍文人，尤其是蜀中文士，在促进文化交流，推动播州文化发展方面，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。就贵州文教发展的总体概况而言，黔北地区受巴蜀文化影响较深，汉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较其他地区为优。这固然与该地区经济条件较佳有关，但也应归功于杨氏领主“留意艺文”，招徕文士的得宜措施。对此，郑珍在《遵义府志》中作了较为中肯评价，现摘录如下：

遵义自晋后，经六代不见天日；隋末唐初，开山峒，招豪长，始稍稍木刊棘剪矣。柳、刘（指柳宗元、刘禹锡）有兴化才，而未果至其地。不旋踵，杨氏遂取之南诏，出五代之

乱以入于宋。据宋文献（应为宪，即宋濂）《杨氏家传》，南渡以前，上下州不相能，闽罗诸蛮僚世世构杀，亦不暇修文矣。选始嗜读书，岁致四方贤士以十百计；轼留意艺文，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、攻文字，土俗大变。至桀乃建学养士；价乃以取播士请于朝，而每岁贡三人。然则天荒之破，杨氏之功也。

到元朝杨汉英执掌播州时期，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一个高峰。他“急教化，大治泮宫，南北士来归者众，皆量材用之”（《遵义府志·土官》）吸收了大量“南北”文人学士，并让他们充分发挥才智。汉英本人非常好学，成了当时名播京师的学者与诗人，写了《明哲要览》、《桃溪内外集》等学术专著与诗文集。可惜其后裔日益骄横，轻贱文士，甚而迫害有才学的读书人。到杨应龙当政时，公然举兵反叛，导致播州土司的彻底覆灭，文物古籍大都毁于兵燹。

杨氏领有播州 725 年，从杨桀到杨汉英几代领主执政期间，是播州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鼎盛期，也是它疆域最大、政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。文化的发展，对经济、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。文教的昌明，也促进了武备的振兴。杨桀几次捐输马匹和银钱，送往抗金前线；杨价、杨文几度派兵入川抗击蒙古兵，取得赫赫战功。播州的隐士冉璉、冉璞两弟兄，文才武略兼备，受宋军四川统帅余玠之请，为他设计并督修合江钓鱼山联防城堡，成为遏制蒙古大兵的坚固防线。宋军凭借这群城堡，多次阻击蒙古兵。蒙古大汗蒙哥，就在钓鱼城下中箭身亡。这群城堡保障了南宋王朝西部安全，使它得以延续数十年之久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。冉氏兄弟这样的军事奇才居然出在素称“蛮荒之区”的播州，这也是个奇迹。奇迹的出现并非偶然，

它与中原文化、巴蜀文化的影响关系极大。冉氏兄弟接受了蜀中文士的教育，阅读了中国古代经史与军事文献，才使他们开启心智，成为富有战略眼光的军事战略家和城防建筑家。

总之，杨氏领主中几位开明的执政者重视文化教育，在推动黔中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方面，都是有一定贡献的。

王阳明与贵州教育

王守仁（人们称他阳明先生）受权阉刘瑾迫害，被贬为龙场驿丞。他长途跋涉，历尽艰辛，于明正德三年（公元 1508 年）三月到达龙场驿（今贵州修文县境）。这里山深林密，多虺蛇虎狼，雾瘴蛮烟，而且粮食匮乏，仆夫患病。他不得不亲自耕种庄稼、浇园锄草，还得采薪作饭。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炼，他终于悟出了“格物致知”的“圣人之道”，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，并在这里讲学授徒，创修“龙冈书院”。

龙场驿周围居住的都是“夷人”。当时由水东土司宋氏管辖。王阳明同“夷人”相处得很融洽，在生活方面得他们许多帮助，时时卫护他的安全。当时贵州巡抚王质派人到龙场驿凌辱王阳明，“夷民”把来人围起来羞辱一番。来人向王质告状，王质要阳明认错谢罪，阳明坚决不干。当时贵州按察副使毛科是阳明的同乡，写信来劝阳明认错了事。阳明复信辨驳，义正辞严。王质虽然衔恨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当地的“夷人”，有苗族、彝族，也有仡佬族。王阳明把他的子弟选择部分来读书，讲授儒家经典、诗文，很得“夷人”的爱戴。

阳明初到龙场驿，扎了座小茅庵居住，既透风，又漏雨。

后发现东边有个山洞，便搬进洞中，取名“阳明小洞天”，成了穴居之士。“夷民们”见山洞太阴湿，便齐心协力砍伐树木，为王先生修建木房一幢，不到一个月就落成，又建了小轩一座。各地的学子听说，都到新居来请王先生教读。于是，王阳明把这幢木房改名“龙冈书院”，小轩改名“何陋轩”，写了《龙冈新构》等几首诗。在“夷民”的帮助下，陆续修建了“寅宾堂”、“君子亭”、“玩易窝”，阳明分别写了《记》。

由于房舍宽敞，前来就学的门生渐多。阳明先生除讲授课督之外，还不时同学生游山探洞，或赏月抚琴，或射壶请宴，饮酒吟啸。教学生活既严肃充实，也生动有趣。如《诸生来》中写道：

门生颇群集，樽俎亦时展。讲习性所乐，记问复怀
面见，林行或沿涧，洞游还陟山。月榭坐鸣琴，云窗卧披
卷。淡泊生道真，旷达匪荒宴。岂必鹿门栖，自得乃高
践。

有时学生携带佳羞美酒，远道来敬奉老师，大家分席夜坐，举杯共饮，或沿溪赏月，或受邻翁招饮，别是一番情趣。

《诸生夜坐》中描绘了师生同乐的情景：

投箸雁鹜进，携榼各有羞。分席夜堂坐，绛蜡清樽
浮。鸣琴复散帙，壶矢交觥筹。夜弄溪上月，晓陟林间
丘。村翁或招饮，洞客偕探幽。讲习有其乐，谈笑无俗
流。缅怀风沂兴，千载相为谋。

虽在丛山峻岭之间，也有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情趣。

在教学方面，阳明先生除每日按时教读、课做、习礼等节目外，有时还同学生讨论。他写有一篇《龙场诸生问答》，讨论

了‘仕以行道’、‘禄仕’以及‘贤者用于世’等问题。师生之间自由问答，平等研讨，形式活泼，内容充实，引人入胜。

为了激励诸生勤苦向学，阳明先生写了《教条示龙场诸生》一文，提出必须遵循的四条准则，即“一日立志，二曰勤学，三曰改过，四曰责善”，要大家“慎听毋忽”。

“立志”一节阐述立志的意义，指出“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虽百工技艺，未有不本于志者”。一个人能否在事业上成功，决定于他是否立定志向；如果不立志，就如“无舵之舟，无衔之马，漂荡奔逸，终亦何所底乎”！他要诸生立志“为善，为君子”，不要“为恶、为小人”。至于所谓‘善’、‘恶’的标准，则视‘父母’、‘兄弟’和‘宗族乡党’的态度来决定。这就难免有偏颇了。“立志”一节，表现了王阳明重视德育，鼓励学生树立为善、为君子的人生观和奋斗目标，这是可取的。

“勤学”一节，提出衡量学生的标尺：“不以聪慧警捷为高，而以勤确谦抑为上。”不管你聪明与否，只看你是否勤苦谦虚。文中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“自矜自是”、不虚心学习，和谦虚谨慎；“勤学好问”这两种人的表现。前一种人往往“虚而为盈，无而为有，讳己之不能，忌人之有善，自矜自是，大言欺人”，即使他“资禀”超出于同辈，终会使人“疾恶”之；“鄙贱”之。后一种人“谦默自持，无能自处，笃志力行，勤学好问，称人之善，而咎己之失，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，忠信乐易，表里一致”，即使他很“鲁钝”，总会赢得人们的“称慕”和“敬尚”。标准明确，是非清楚，使学生们易于辨别，乐于仿效。

“改过”一节，从日常言行谈起，阐述勇于改过终能成为贤人君子的道理。多方而提出疑问，反复辨析，使于改过从善的遁词，确是悔之谆谆，语重心长。

“责善”一节，讲述规劝朋友的方式方法。朋友有过失，必须“忠告而善道之，悉其忠爱，致其婉曲”，使之听后乐于改过；要是“暴白其过恶，痛极毁诋”，这势必引起反感，反而激之而使为恶。因此，他要求不揭发他人的短处和阴私；至于对老师的过失，也应该加以谏阻，但要掌握“直而不至于犯，婉而不至于隐”的分寸。

阳明先生的这四条教示，算是他执教龙冈书院的教育总纲。先从德育入手，进而加强智育，要求明确，道理明白，无论待己待人，都入情入理，有一种引人为善、激发上进的力量。这对以往少受教育、文化落后的龙场诸生，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来说，无疑是很大的鼓舞。

对教学程序、教学方法，王阳明也很讲究。他后来写成《教约》一文，是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。在龙冈书院两年多的教学活动，是他一生从事教育的起点，《教约》中所规定的“每日工夫”，自然是在这里首先实施的。所谓“每日工夫”，即先考德，次背诵书，次习礼，或作课做，次复诵书讲书，次歌诗。

考德在每天清晨进行，教读之前以次遍询诸生，从是否孝敬尊长，往来街衢的礼节，到一应言行心术，要学童以实回答，有错则改，无则加勉。教读时再针对学童表现加以教谕和启发，然后退回座位读书、作业。

对歌诗的容止、声音、气度都有具体要求，并分班轮流朗诵，每半月举行全书院歌诗朗诵。习礼则每班间日轮一次，每十天由四个班依次演习一次，每半月举行全书院的总演习。

每次授书，要根据学童接受力决定内容的多少，不求多，但贵精熟。凡“能二百字者，止可授以一白字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，则无厌苦之患，而有自得之美”。这正是“量力性原则”

和“积极性原则”的具体表现。对讽诵经文时的注意力、音节奏等也有具体要求。这样长期实践，就可使学童们“义礼浹洽，聪明日开”了。

王阳明的《教约》，把德育、智育、美育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不仅有理论价值，更有指导教学实践的普遍意义。

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，名声逐渐传扬开去。他的同乡毛科（号拙庵）任按察司副使兼提学副使，一度招请他去省城（当时为程番府治，40多年后才改为贵阳府）讲学，他写了《答毛拙庵见招书院》一诗。诗云：

野夫病卧成疏懒，书卷长抛旧学荒。岂有威仪镇法象，实惭文檄过称扬。移居正拟投医肆，虚席仍烦避讲堂。范我定应无所获，空令多士笑王良。

阳明自知威望还不高，很谦虚地婉言辞谢。不久，毛氏致仕归里，接任提学副使的席书（字文同），闻王阳明正在阐扬陆九渊“心学”微旨，便同他讨论程、朱理学与陆氏理学的异同。席书一向研治宋代理学，醉心周、程、朱子之学。王阳明以“知行本体”为例，证明自己所悟之学。通过往复数次的讨论，席书“豁然大悟，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”（《王文成公年谱》），对阳明先生衷心敬服。为了让全省生员都能接受阳明先生的熏陶，提高“道义”修养与文化素质，特地写了一封书札，敦请王先生来省城文明书院讲学。敦请书先分析了“举业”的流弊及实际意义，又指出“贵南之士”学习方面的弱点。书中说：“贵南之士，安于土俗，诱以利禄，尚不乐从，教以举业，复不能治。幸有治者，日省月试，又不能工，而况大于举业者乎！舍是以教贵南，诚难矣！夫举业者，利禄之媒也。世之皓首一经，凡为利禄而已。”人们为利禄而终身读经文、学八股，误

了天下不少豪杰。但是，有为之士也常通过科举道路而知所向上，取得道义、学术、文章诸方面的成就。书中对王阳明的教学内容和“德业”并进的作法很推崇，如说：“今之教者，能本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，则亦何相妨哉！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，晚以道理发为文章。倘无厌弃尘学，因进讲之间，晤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，进以古人之德业，是执事一举而诸生两有所益矣！”

王阳明见席书的敦请书情词恳切，欣然应聘，于正德四年（公元1509年）十一月赴贵州省城，主讲于文明书院。席书挑选各州、县成绩优秀的生员来书院受业，并“身率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”（《年谱》）。公余之暇，还亲自到书院拜见阳明先生，请教性理之学，相互讨论，有时直至半夜，而诸生环而观听者，达数百人之多。从此，王氏心性之学在贵州广为传播，学者、文人不断涌现。

当时亲聆阳明先生警咳，后来成为黔中名人的，有陈文学（字宗鲁）、汤昇（字伯元）等，他们在诗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很有成就。阳明还写有《示陈宗鲁诗》，诗中有“子才良可进，望汝师圣贤”之句，对宗鲁期望殷切。阳明先生在黔中的再传子弟，有清平孙应鳌（字山甫）、思南李渭（字同野），他们研治王氏心性之学，著作多种，在全国学术界都很有影响。

在贵州教育史上，王阳明是传播儒家思想、促进黔中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人物。他离开贵州后，人们以他的名号建书院、修纪念祠、刻碑记，至今将近500年，许多建筑多次重修、整饰一新。如明嘉靖年间，王杏修建阳明书院；清雍正年间扩建后改名贵山书院，成了贵州最大的书院，清朝末年，将